

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初探

毛昭晰 (浙江大学 310028)

[摘要]

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都发现有支石墓和史前稻作农业遗存。本文从支石墓和稻作遗存的比较研究中,推断先秦时代两地存在着海上文化交流,古越人的造船、航海技术以及海流和季风是两地海上交往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 先秦时代 中国江南 朝鲜半岛 支石墓 稻作农业 海上交通

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朝鲜半岛的大江,多是向西流入大海,史前遗址和古代的著名城市大多分布在西海岸而不在东海岸,由此可以证明古代朝鲜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总是以为中国北方和朝鲜半岛距离较近,来往方便,

所以在研究先秦时代中韩关系的时候,往往把注意力投向北方而忽视了中国的江南地区。诚然,只看海上航行的距离,从江南到朝鲜半岛比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要远得多,但这不足以说明先秦时代江南和朝鲜半岛之间没有海上往来。实际上,先秦时代江南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文化交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

一支石墓问题

从考古学的角度说,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支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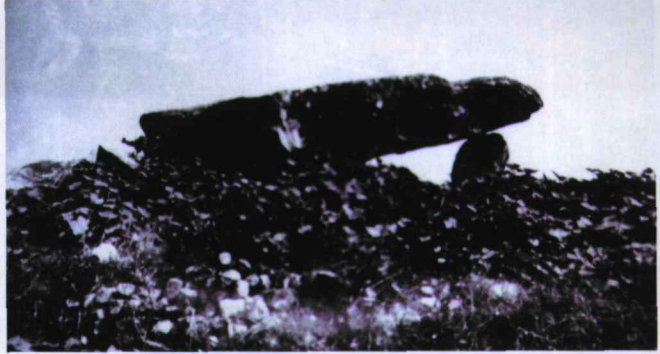
支石墓是巨石文化(Megalithic culture)中的一种墓葬形式,欧洲称之为Dolmen,我国考古界称之为石棚墓或石棚,浙南民间称为抬石墓,日本和朝鲜则称之为支石墓。我觉得“支石墓”的名称比“石棚墓”或“石棚”妥当。因支石墓除了墓葬内部地面



作者在韩国全罗南道和顺郡大薪里考察支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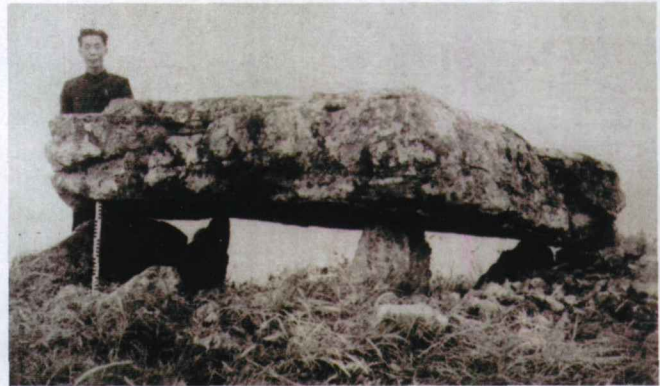
韩国全罗南道和顺郡大薪里支石墓



瑞安市棋盘山东山岗1号支石墓(倒塌前)(瑞安市文管会提供)



韩国全罗南道碧松里支石墓



瑞安市岱石山支石墓(已毁)(见《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



韩国济州岛支石墓



瑞安市杨梅山支石墓

和葬坑之外,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盖石,二是支石。盖石多是未经加工的巨大石块,形状有板状、团块状和板块混合状。支石是在盖石下面支撑盖石的石头。这种石头有的是巨大的石板,竖立着支撑盖石,有的是多块竖立的条石,有的则是大小不等的块石。由石板支撑的支石墓,形状确实像石棚,而由块石支撑的支石墓,并不像石棚,这种支石墓的数量很多,其中最大的一座在韩国全罗南道的和顺郡大薪里,盖石呈团块状,重达一百吨以上,盖石下的支石只有透过地面与盖石底部的一点点缝隙才能看到。这样的形状,无论如何也难以用“棚”字来形容的。据此,我认为“支石墓”

一词可以涵盖“石棚墓”,而“石棚墓”则不能包括所有的支石墓。在巨大的盖石下用支石来支撑,是这种墓葬的共同特点,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盖石下面只有土坑而没有支撑盖石的支石,这样的墓只能称为“石盖墓”或“大石盖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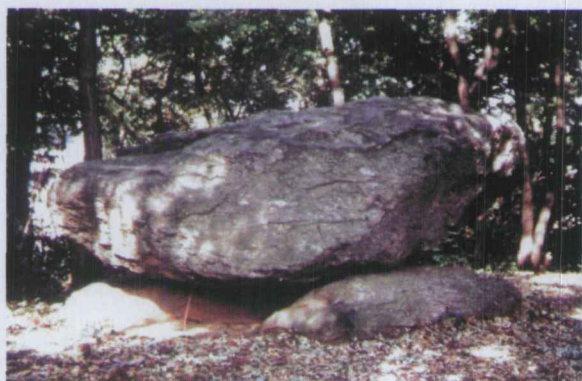
支石墓分布的范围很广,在北欧、西欧、中近东、南印度、东南亚及东亚都有发现。东亚支石墓最多的地方是朝鲜半岛,特别是韩国南部,据金贞姬 1990 年的报导,仅在全罗南道就有支石墓一万一千一百零二座^{〔1〕}。但根据近年韩国学者的调查,全罗南道的支石墓远远不止这个数字。韩国国立木浦大学李荣



韩国全罗北道竹林里支石墓



苍南县洞桥村3号支石墓(金阳阳 摄)



韩国清水市支石墓



瑞安市棋盘山西山岗1号支石墓



韩国全罗北道竹林里支石墓



瑞安市岱石山4号支石墓

文教授告诉我,全罗南道的支石墓超过二万座,这是他多年来实地调查的结论。这样,整个朝鲜半岛的支石墓可能接近三万座⁽²⁾,可以说朝鲜半岛是东亚支石墓的中心。朝鲜半岛支石墓的形制,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梅原末治、藤田亮策等把它区分为北方式(桌子式)和南方式(棋盘式)两种。20世纪60年代初,三上次男根据南方式支石墓下部结构的不同,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1964年韩国学者林炳泰提出桌子式、棋盘式和无支石式的三分法,在三种类型下面又分出了八个次类型(Subtype),有的次类型下面分出了更小的类型⁽³⁾。1967年金载元、尹武

炳在赞同北方式和南方式分类法的同时,又把南方式支石墓分为A、B两个次类型,其下又分出I、II、III三类,每类又分a、b两个更小的类型⁽⁴⁾。其他许多韩国学者如金元龙、黄基德、崔梦龙、池健吉、金贞姬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都有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北方式和南方式是不确切的用语,所以主张用五德型(典型支石墓)和沈村型(变形支石墓)来代替北方式和南方式的称呼⁽⁵⁾。本文并不想讨论朝鲜半岛支石墓的类型问题,而只是想从朝鲜支石墓的类型来探索它和中国江南的关系。在我看来,南方式(棋盘式)或北



韩国全罗北道竹林里支石墓



韩国全罗北道竹林里支石墓



韩国济州岛南部加波岛支石墓

方式(桌子式)这两种支石墓虽然在地区的分布上没有绝对分明的界线。但是在朝鲜半岛,北方式支石墓多在北方,而南方式支石墓多在南方。实际上在江华岛(三八线附近)以南的韩国,大量分布的是南方式支石墓,北方式的支石墓并不多。在全罗北道高敞郡的道山里还可以看到一座典型的北方式支石墓,但到全罗南道就见不到这样的支石墓了,在那里虽然也有北方式的支石墓,但都比较矮,盖石下两边各有一块石板作为支石,盖石也多是板块混合状,如果不注意,就会把它当作南方式支石墓。北方式和南方式支石墓可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文化在地域的分布上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并不足怪,不能因为南方有北方式的支石墓,北方也有南方式的支石墓而否定这种分类法的合理性。

中国支石墓较集中的地方是东北地区的辽东半岛和吉林省西南部,前者已发现支石墓 101 座⁽⁶⁾,后者发现约 70 座⁽⁷⁾。使人非常感兴趣的是在中国江南地区的浙江省也发现了支石墓。1956 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3 年改名为浙江省文物局)的考古工作人员在温州瑞安县莘塍区岱石山发现了两座支石墓,其中一座当时保存较完好,但“文革”期间这两座支石墓均被毁。1983 年浙江省文物局在全省开展文物普查,在温州瑞安县莘塍区的岱石山、马屿区的棋盘山、塘下区的杨梅山又发现了一些支石墓,以后在温州平阳市的龙山头,苍南县钱库镇的洞桥村,台州三门县的满山岛以及东阳市六石镇的祥湖村又先后发现了一些支石墓。据我目前的统计,浙江全省共有支石墓 54 座,其中瑞安市岱石山 33 座,棋盘山东山岗 2 座,棋盘山西山岗 2 座,杨梅山 1 座;平阳县龙山头 3 座;苍南县洞桥村 7 座(3 座盖石已

毁);三门县满山岛 5 座(均无盖石);东阳祥湖村 1 座。此外岱石山还有 3 座无支石的石盖墓。这些支石墓的形制,除了东阳祥湖村的那一座可能是从支石墓到土墩石室墓的过渡形态。其余的(无盖石的除外)我曾把它们区分为四种类型⁽⁸⁾。这些类型和我国东北发现的北方式支石墓不一样,而与朝鲜半岛(特别是济州岛)的南方式支石墓有许多相似之处。高丽大学教授金贞培认为浙江省的支石墓是“变形支石墓(所谓南方式支石墓)”,与“典型支石墓”不同。他在《韩国和辽东半岛的支石墓》一文中说:辽东半岛的支石墓主要是典型支石墓,与韩国的北方式支石墓有相通之处⁽⁹⁾这一意见很重要。如果辽东半岛和吉林西南部的“典型支石墓”和韩国北方式支石墓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即秽貊族遗留下来的



平阳县龙山头 2 号支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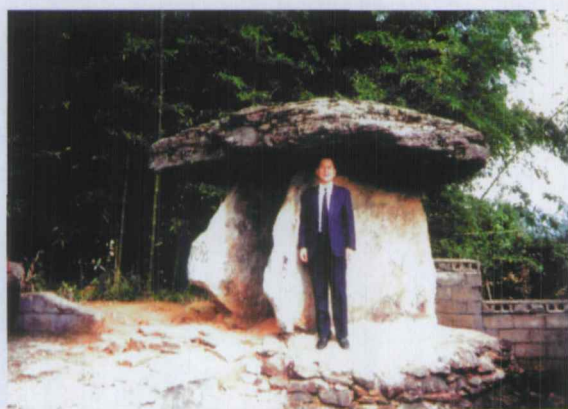


韩国济州岛光令里光令型支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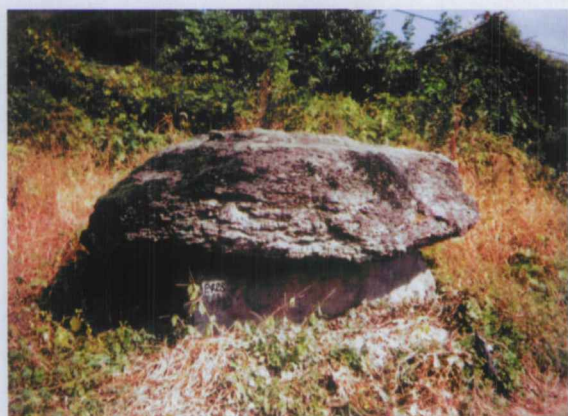
(采自光冈雅彦《支石墓の謎》107 页,学生社)



韩国江华岛富近里北方式支石墓



韩国全罗北道道山里北方式支石墓



韩国全罗北道竹林里北方式支石墓

文化的话,那么在韩国西南部以及浙江发现的“变形支石墓”(南方式支石墓)是不是也可以视为另一种文化圈,或者相互之间存在着文化的交流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济州岛光令型的支石墓,这种支石墓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其前端有一块比较高的支石支撑着巨大的盖石,这是济州岛特有的。而在浙江的平阳市龙山头也发现了具有这种特点的支石墓(龙山头1号墓、龙山头2号墓)这似乎很难用偶然的巧合来作解释。

浙江支石墓的年代,从温州地区支石墓中发现的少量器物来推断,大约在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朝鲜半岛的支石墓,石光濬曾根据西北地方沈村型和五德型的情况定了一个编年,从沈村1型开始到五德3型,大致是公元前20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¹⁰⁾。但是在朝鲜半岛的南部,公元前3世纪还有五德1型存在⁽¹¹⁾,所以朝鲜半岛支石墓延续的时间大约还要晚。由于我所见到的韩国支石墓的资料从整个韩国支石墓的数量来说仅仅是一小部分,所以不敢妄下断语。但不管怎么说,浙江支石墓和韩国支石墓的比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正如金贞培教授在1997年7月考察了浙江支石墓之后给我的信中所说的:“韩半岛有二万余个支石墓,而在浙江省也发现了这种支石墓,证实了两地在史前时代确实有过文化交流。”我深信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二 稻作农业

考古资料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稻作农业。

朝鲜半岛的农耕文化起源很早。早期的农业是旱作农业,水田农业的兴起比旱作农业要晚。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稻作农业遗址不断被发现,对朝鲜半岛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据韩国学者李春宁教授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发现的有稻谷遗存的遗址有15处,除全罗南道罗州发现的是花粉之外,其他遗址发现的都是炭化米和稻压痕⁽¹²⁾。这些遗址中最重要的是欣岩里、松菊里和平壤市湖南里的南京遗址。欣岩里出土炭化米81粒,时间距今约3260—2670年⁽¹³⁾,遗址所在地是高于水面80—100米的丘陵,所以可能不是水田稻作。南京遗址出土炭化米250粒,时间距今约3050年,伴出的还有粟、黍、高粱等旱地作物。松菊里遗址年代较晚,距今约2715—2670年,在遗址的54号居住遗迹中出土395克



跨湖桥遗址出土炭化稻谷 (李永嘉 摄)

炭化米,在这里没有发现旱地作物的谷粒。

1992年以来,在韩国国家瓦地遗址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稻壳,经碳 14 测定,其年代距今 4721 ± 50 年,经树轮校正约为距今 5020 年⁽¹⁴⁾。这一年代大致相当于江南的良渚文化早期偏晚,这对于研究朝鲜半岛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现在多数学者认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原先曾经流行一时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已经很少有赞同者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淮河流域也是栽培稻的起源地,理由是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约 8000 年前的稻谷⁽¹⁵⁾。但是从地理位置说,贾湖遗址处于靠近汉水流域的地方。这和黄河流域的前仰韶时期到仰韶文化早期的稻作遗址如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河南浙川下集、下王岗等都分布在靠近长江流域的地区有些相似。因此不能不使人考虑到黄淮流域的稻作农业是源于长江流域的。有人统计中国稻作遗址的数目,截至 1992 年,共发现 112 处,其中长江中下游 86 处,占 76.8%;黄河和淮河流域 12 处,占 10.7%;华南地区(广东、福建、台湾)8 处,云南 4 处,东北辽宁 1 处⁽¹⁶⁾。长江中下游

的稻作农业遗址不仅多而集中,年代也早于中国其他地区,因此中国多数考古学者和农史学者认为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中心,从这里向北传入华北的黄河流域,向南传入华南和西南地区,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在稻作的起源和传播中,江南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从我们目前所知的材料,仅在浙江一省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有稻谷遗存的遗址有 20 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有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等遗址。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的年代都在距今 7000 年前。河姆渡遗址稻作文化的考古内涵十分丰富,出土的稻谷、器物、建筑和动植物遗存之多是中国任何一个史前稻作遗址所无法相比的。1990 年浙江萧山发现了跨湖桥遗址,经 1990 年、2001 年、2002 年三次发掘,发现了稻谷颗粒,其年代经碳 14 测定在距今 8000—7000 年之间,还发现了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的骨耜⁽¹⁷⁾。2003 年 6 月,在距跨湖桥遗址 5 华里的湘湖村又发现了稻谷遗存,其年代为距今 8000 年前⁽¹⁸⁾。2001 年,在浙江中部浦阳江上游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上山遗址,考古学者在夹炭陶的陶胎中发现了大量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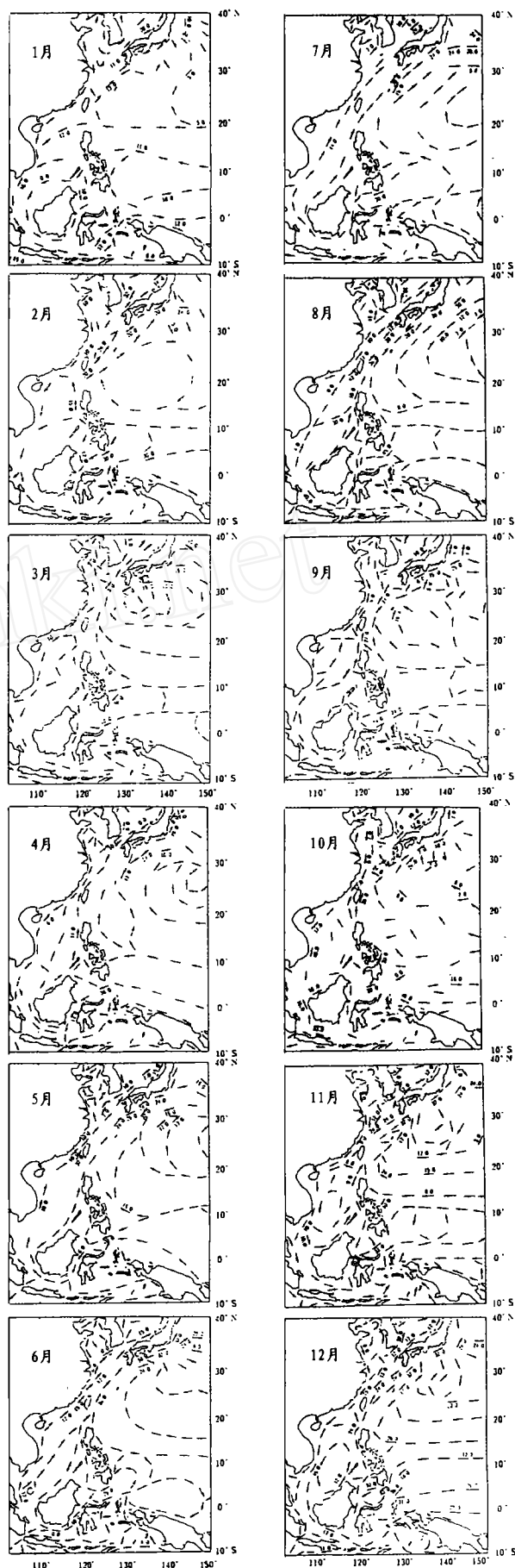
跨湖桥遗址出土独木船

明显的稻谷颗粒,夹炭陶片表面还有大量谷壳印痕。稻粒长度比野生稻短,宽度比野生稻大,可能是早期的栽培稻。不同层位的4个夹炭陶标本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最早数据距今 9610 ± 160 年,最晚数据 8050 ± 110 年。4个数据的树轮校正值约在距今11400—8600年之间⁽¹⁹⁾。这一新发现,将浙江稻作农业的起源推前到距今一万年左右。我在这里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证明7000年前或更早,江南和朝鲜半岛已经有了稻作农业的交流。而是想说明江南稻作农业的起源很早,在七八千年之前,这里的居民就已经以稻米为主食,并且在农耕技术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技术水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以稻米为主食并且掌握有种稻技术的人才有可能去传播稻作农业。这是稻作传播的先决条件。中国古代华北地区的居民以粟和黍为主食,他们栽培是粟和黍,而不是稻。这样的人向朝鲜半岛传播的应该是粟和黍,而不是稻。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朝鲜半岛的稻作农业源于中国,这一点中韩两国学者的意见基本一致。问题在于它从什么地方,通过什么路线传入朝鲜。在考虑稻作东传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在浙江发现的支石墓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韩国南部的支石墓影响了浙江的支石墓还是浙江的支石墓影响了韩国南部的支石墓。但是两者的支石墓如果确有联系的话,那么这种联系必定是通过海上的道路建立起来的。稻作的东传也可以把陆上道路排除在外,它必定是通过海上的道路传向朝鲜半岛的。

三 关于海上道路的探讨

为什么要把陆上的路线排除在外?从支石墓来说,中国东北的支石墓只在辽河以东的地方才有,辽河以西至今还没有发现过支石墓。因此浙江的支石墓绝不可能通过中国北方的陆路和朝鲜半岛发生联系。至于稻作农业,也不可能走北方的陆路,因为河北省和辽宁省都是粟和黍等旱作农业地区,河北省至今没有发现稻作遗址。辽宁省的红山文化、新乐文化发现的谷物是粟和黍⁽²⁰⁾。稻作文化要从这样的地区传入朝鲜半岛是不能想象的。



西太平洋海流图(采自盛永俊太郎等《稻の日本史》附图《日本南方海域の海流图》,筑摩书房,1975年)

陆路既然不可能,剩下的就只有海路。可能的海路有这样几条:第一条,从长江下游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第二条,从长江下游经山东半岛渡黄海至朝鲜半岛;第三条,从淮河下游渡黄海到朝鲜半岛;第四条,从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向东直达朝鲜半岛。

第一条路线因近年在大连湾的大嘴子遗址的一座房基中发现有距今 3000 年之前的炭化粳稻遗存而被一些学者赞同。但是也是在辽东半岛的大连市,在其附近的郭家村遗址的一座房址中发现了装在席篓中已炭化的粟。这告诉我们稻作农业即使在东传途中曾在辽东半岛停留,但充其量只能是“与粟作技术同时存在”,“不可能是稻作东传的主线”⁽²¹⁾。

第二条路线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古代山东是粟作农业地区,稻作的考古材料太少,迄今发现的水稻遗存主要有: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稻壳稻谷的痕迹,日照尧王城遗址发现 10 余粒炭化的粳米,滕州庄里西遗址发现人工栽培的水稻百余粒,临淄田旺遗址发现水稻的植物硅酸体,日照两城镇遗址土壤中发现有水稻硅酸体。

第三条路线,淮河下游的稻作考古资料也很少,目前所知的有 3 处,一、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曾采集到夹有稻壳的红烧土,二、赣榆县盐仓城遗址曾采集到炭化稻粒,三、东海县焦庄遗址据说曾采集到商代炭化稻粒。报导都非常简短,而且都是采集品⁽²²⁾。根据这些材料很难作出稻作农业从淮河下游直接渡海到达朝鲜半岛的结论。

如果把上面三条路线(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淮河下游)的稻作遗址加在一起,其总数还不及朝鲜半岛稻作遗址的一半,这总使人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先秦时代稻作农业在这些地方并没有站住脚跟。

我的浅见是,稻作东传的最可能的路线是第四条,也就是从江南地区渡海直接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由于这条路线海上航程较远,所以有些人认为先秦时代的人要越过这样的大海进行交往,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分析各方面的因素,这条路线实在比其他各条路线具备更优越的条件。

第一,江南地区是中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这里的古代居民自进入农耕生活之时,就以稻米为主食。“饭稻羹鱼”是对江南居民饮食特点的生动描写。新石器时代江南的稻作遗址,数量多而密集,除前面所述的浙江省的遗址之外还有许多遗址分布在太湖流域,较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仙蠡墩、锡山、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越城、吴江龙南、上海青浦松泽和马桥等等。只有居住在江南的这样一些长期从事稻作农业的农业民才有可能成为稻作的传播者。

第二,传播稻作农业的农耕民,除了熟悉稻作技术之外,还应该具备海上航行的条件和经验。江南的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濒临东海。沿岸岸线曲折,港湾众多,岛屿密布,为古代居民的海上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发源于浙江的越人自古以来就以善于驾舟而闻名于世,《淮南子·齐俗训》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绝书·记地传》也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人这种“便于舟”的传统在考古材料中得到证实。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曾出土六支木桨,全部用单块木材加工而成,柄叶两部分自然相连。比河姆渡时代晚些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和杭州水田畝遗址也出土了几支木桨。2002 年萧山跨湖桥遗址第三次发掘时,在 T0512 的西北角发现了一条独木船。船体位置呈西南—东北方向,船体西南端因砖瓦厂取土被截断,残存船体长 5.6 米,宽约 53 厘米。东北端的船头宽约 29 厘米,略上翘。独木船所在的地层在最早的第 9 层,船的标本和陶片标本经北京大学和上海博物馆碳 14 测定和热释光测定,其年代都在距今 8000 年上下⁽²³⁾。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船。它和河姆渡、钱山漾等多处遗址中发现的木桨,都说明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水上航行已经相当普遍。这种航行不仅仅局限于内河湖泊,而且早在河姆渡时期就已经发展到海上了。首先是因为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真鲨(Carcharhinus sp)及灰裸顶鲷(Gymnocranius griseus)等海生动物的骨骼⁽²⁴⁾,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河姆渡离海岸很近,人们的捕捞范围已经进到海上。其次,在浙江省东北的舟山群岛的一些岛屿上发现了四五十处新石器时代遗

址。其中舟山本岛白泉镇附近的十字路遗址的器物属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偏晚,定年在距今5700—5300年,大衢岛孙家山遗址和舟山本岛的马岙遗址属河姆渡第一文化层和良渚文化时期或更晚,年代未经测定,但从器物推断,可能在距今5500年至4000年左右。距大陆最远的遗址在嵊泗岛的菜园镇。十字路、马岙及金塘岛的中高墩三处还发现了稻谷遗存。这些考古材料说明早在五千多年之前,浙江沿海地区的居民已经能够在海上活动,并且到舟山群岛居住和种植水稻了。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杭州湾及其附近地区的海上活动更为频繁,范围也更扩大。据《周书》记载,周成王时“於越献舟”。当时中国还没有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越人献舟,必定要沿海岸北上,然后进入淮水或济水,才能到达周人的统治中心。公元前468年,越国首都从会稽迁到琅玕,据《吴越春秋》记载,迁都时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越人在海上航行的规模、技术和能力已经达到怎样的水平。《山海经·海内南经》说:“瓠,居海中”,瓠指瓠越,是越人的一支,有西瓠和东瓠,西瓠是从东瓠迁去的,《山海经》中所说的“瓠”应指“东瓠”,其居住范围在今温州一带。现在浙江南部有一条以“瓠”命名的“瓠江”,其出海口就在温州。实际上温州并不在海中而是在沿海地带,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说他们住在海中呢,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在海上来往,所以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居住在海中了。

当然,越人的海上活动,开始时一定在近海或岛屿之间,以后才逐渐从近海到远洋。在近海取得了丰富的航行经验以后,才能进行远洋航行,这是人类航海活动的一般规律。浙江沿海有3000多个岛屿,特别是舟山群岛,海域辽阔,有岛屿1339个,是中国最大的群岛,也是古代越人锻炼海上航行技术的最好场所。经过几千年的海上活动,他们取得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所以完全有可能渡海到达朝鲜、日本或其他一些遥远的地方。

第三,从海流和季风等自然因素来说,江南道路也具有很有利的条件。

先说海流。江南东面的海流,每年1至4月从北往南。5月份开始转向东北。6至8月都是从南流向

东北。从9月开始到次年4月,又从北向南⁽²⁵⁾。在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还不很发达的时候,借助海流的力量从中国的江南(特别是舟山群岛)用比较简陋的航海工具渡海直达朝鲜半岛,是比从山东半岛渡海更为理想的航线。

再说季风。季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风向、风速随季节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中国是典型的季风国家,特别是沿海地区,冬季多北风和西北风,夏季多南风,春季多东北风和东风,秋季多西风和西南风。在风帆发明后,季风也成了江南海上航线的重要动力。

有一些人常常根据地图所绘海上距离之长短来判定海上交通之难易,于是就很自然地选中了山东半岛作为通往朝鲜半岛的启航地。但从山东半岛的成山角或其他地方直航朝鲜半岛西岸,要横渡黄海中部,这一水域终年有南北向的海流,对东西向的航行极为不利。黄海的季风,夏季多偏南风,冬季多偏北风,对帆船的东西向航行也很不利。日本学者桥本进曾经对遣唐使船只的航行路线作过统计。北路从日本出发的船6只,遭难2只,遭难率约33%,返航4只,遭难1只,遭难率约25%。南路从日本启航26只,遭难4只,遭难率约15%,返航22只,遭难2只,遭难率约9%。他认为从扬子江口直航九州的路线是遭难率最低的路线⁽²⁶⁾。这虽然是遣唐使船的统计资料,但涉及自然条件中航行的安危,却是一样的。先秦时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比唐代要原始,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更大,所以桥本进的统计很有参考价值。

四 结束语

(一)无论是支石墓还是稻作农业,都说明中国江南沿海和朝鲜半岛之间在先秦时代存在着海上交往的关系。这种交往,最可能的路线是江南和朝鲜半岛之间的直航。从古代越人的航海技术和海流、季风等自然条件来看,江南路线甚至比山东路线更为有利。

(二)由于古代的海上航行,受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较大,所以不能排除偶然性的因素。基于这一原因,所以不能排斥江南与朝鲜半岛海上直航之外的其他路线的可能。

(三) 先秦时代江南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往,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有许多问题,例如陶器、石器、青铜器等古器物的比较,又如民俗考古学上鸟崇拜、文身现象、拔牙习俗的研究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努力。

(本文图片除注明出处外均由作者摄影)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

注 释

(1) 金贞姬:《韩半岛にすける支石墓研究の最近动向とその成果》,见八幡一郎、田村晃一编《アジアの巨石文化——トルメン支石墓考》,六兴出版,1990。

(2) 李荣文教授是韩国支石墓的权威学者,他的博士论文是《全罗南道の支石墓》,他对全罗南道の支石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出版了许多专著。2000年他花了几乎一星期的时间,陪我考察了全罗南道の光州、和顺等许多地方的支石墓。

(3) 林炳泰:《韩国支石墓的形式与年代问题》,《史丛》第九辑,第94-127页,高丽大学校史学会,1964年12月。

(4) 金载元、尹武炳:《韩国支石墓研究》,国立博物馆,古迹调查报告第六册,第67页,1967年。

(5) 参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朝鲜考古学概要》,李云铎译,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出版,1983年,第3期,第19页。

(6) 许玉林:《辽东半岛石棚之研究》,《北方文物》1985年,第3期,第19页。

(7) 王洪峰:《石棚墓葬研究》,见《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

(8) 毛昭晰:《浙江支石墓的形制与朝鲜支石墓的比较》,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9) 金贞培:《韩国和辽东半岛的支石墓》,《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10) 全荣来:《朝鲜半岛支石墓の型式学的展开》,《九州考古学》第66号,九州考古学会,1991,12,第42页。

(11) 同上引文。

(12) 李春宁:《稻作的文化和韩日关系》,见《韩国古代文化的连系》,(财)韩日文化交流基金编著,1994,第10-11页。韩国沈奉谨《韩国的稻作农耕》一文所载年代略有不同,见《农业考古》,1994,3,第107-108页。

(13) 年代均根据李春宁文。

(14) 张居中、王象坤、崔宗均、许文会:《也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农业考古》1996,1,第90页。

(15) 同上引文,第85-91页。

(16) 游修龄、郑云飞:《河姆渡稻谷研究进展及展望》,《农业考古》1995,1,第66页。

(17) 蒋乐平、王屹峰、郑建明、孟国平:《浙江发现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1日。施加农:《跨湖桥,见证8000年的历史》,《第二届杭州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与利用学术研究会论文》,待刊。王屹峰:《跨湖桥遗址刍议》,(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总245期(第21卷第5期),2003年8月。

(18) 同上,施加农文。

(19) 蒋乐平、郑建明、芮顺淦、郑云飞:《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

(20) 李宇峰:《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第74-81页。

(21) 张居中等:《也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农业考古》1996,1,第91页。

(22) 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5,2,第103页。

(23) 蒋乐平、朱倩、郑建明、施加农:《跨湖桥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独木舟》,《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21日。施加农:《跨湖桥,见证8000年的历史》。

(24) 魏丰、吴维堂、张明华、韩德芬:《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海洋出版社,1990。

(25) 参看盛永俊太郎等:《稻の日本史》,筑摩书房,1975年。该书附图《日本南方海域の海流图》有图十二幅,自1月至12月每月一幅,有经纬度、海流经过的海域及流向,并标明了流速。本文第10页采用了此图的主要部分。

(26) 桥本进:《徐福的航海》,见《徐福学への发表》东アジア文化交流振兴协会,1995,第42页。